

见“影”如面：城市远距离家庭的 子代家庭展示与数字亲密关系构建

——基于手机拍照行为的考察

陈红梅，罗鹏飞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文章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从家庭展示的视角对城市远距离家庭中子代的手机拍照实践和数字亲密行为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子代用照片与亲代分享不加修饰的日常生活，打造出习惯性在场、积极独立的理想儿女形象；通过存档、编辑照片促成记忆存续与流转，并与家庭互动相交织。此类日常实践帮助他们在两代人之间主动维系情感纽带，调控个人意识和代际团结间的平衡，同时将家设定为精神上的心安之所。相较于既往研究中亲代再造亲密—联结受挫的过程，子代通过手机拍照将远距离交往变为一种寓于家庭主义中的能动联结，形成连绵不断的协调性情感展示，让我们看到本土及当代语境下家庭亲密关系的新发展。

关键词：远距离家庭；子代；手机拍照；家庭展示；数字亲密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6-0009-10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家庭既是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重要的社会单元和生活组织形式，^[1] 更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成为新型媒介使用的重要场所。在家庭与传播技术的议题中，家庭成员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分居异地的“远距离家庭”成为一类特殊的研究对象，逐渐成为传播学界的研究焦点。

在讨论远距离家庭交往时，“家庭展示”（family display）作为一种强调“看与被看”的家庭实践概念，与移动媒体语境下的家庭交往关系拥有天然的契合度。而在视觉泛滥的社交媒体时代，图像作为一个重要的交往媒介，其所构成的符号世界建构着人们规则性的社会沟通模式，媒介技术的进步则承接人们对它的创作、使用和发展。^[2] 相片已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可能。若将其纳入家庭生活的语境中，亦能构成一个现代家庭交往图景的隐喻。

对于中国，“家”是一种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root metaphor），是探索“中国人社会生命”的关键取径。^[3]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本土的远距离家庭研究，关注的多是农村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的父母之间的联系，对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更能率先反映社会文化变革的城市家庭关注较少，^[4] 对能动性日益增强的子代如何构建代际亲密关系也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以往研究多重视手机来电、微信文字、视频通话等联系方式，对于拍照这种形式的探讨还较为少见，这正是本文的问题出发点。对于已经成年拥有独立生活，或刚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在外子女来说，看似平凡不起眼的手机拍照，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效果研究”（20BXW040）；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社交媒体空间中的集体怀旧与记忆实践研究”（KYCX22_2749）。

作者简介：陈红梅，女，教授，博士；罗鹏飞，男，硕士研究生。

底在与亲代的异地交往中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围绕相片,子代成员如何看待与亲代的交往,这背后又折射出他们怎样的文化逻辑和自我认知?这些现象又能为“家庭展示”的研究脉络提供什么样的启迪?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将以城市远距离家庭中的子代为落脚点,对上述问题逐步展开解答。

二、文献综述

(一) 远距离家庭的代际互动与数字亲密关系

移动传播技术深刻地改变了远距离家庭的代际交往。早有大量研究集中于手机和社交媒体为远距离代际交往提供的便利,认为它们能够帮助家庭成员克服空间阻隔,构建“虚拟在场”,彰显出一种移动的亲密。^[5]随后,一些研究者开始打破简单的技术赋权想象,关注到这种代际互动受性别、技术水平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后的实际情况。如王嵩音发现,Line是台湾亲子之间最常用的交流渠道,而结构连带(人口组成、地理接近性等结构性因素)和规范连带(家庭成员对家庭规范连带的知晓与顺从程度)这两个变量会影响远距离亲子间见面与在线沟通的频率。^[6]吕山以驯化为理论视角关照留守儿童家庭的亲职实践,发现父母将手机主动挪用为一种正向工具,但却遵守着不同的时间结构,在履行亲职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背后结构性的不平等。^[7]

在此语境中,数字亲密关系(digital intimacy)成为一个与其高度相关的概念。“亲密”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概念,指经由一段时间的持续互动产生亲近感后,两个人或群体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投入和参与的情绪状态。^[8]尽管在当代传播学研究中,该术语往往被等同于其狭义,即研究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将虚拟恋人、约会软件使用者、异地情侣等作为研究对象,但远程家庭也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典型社会现象。对异地亲子来说,手机变成了激活亲密关系的主要工具。但诚如前文梳理所示,媒介技术虽然能重新维护家庭关系,让时空分隔不再可怕,却会因为使用者与使用情境的差异而产生新的交流问题。胡春阳等曾对微信用户的使用现状与亲密感进行测量与比较,发现亲人关系的亲密度明显低于恋人与朋友关系,也再次佐证了这种亲密关系仍有质询空间。^[9]探究远距离家庭互动究竟将代际间的亲密关系放置在了何种位置上,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现代家庭如何在一个日益流动的世界中解构和重塑。^[10]

然而,在梳理文献时笔者发现,相比于对流动人口、农村家庭的关注,前人对城市家庭传播实践的研究依然较少。诚然,打工父母与留守儿童是特有的流动现象,但城市站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潮头,其价值矛盾问题更为凸显,如新兴的子代主体性、个体主义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代际差异^[11]等,有较为丰富的探讨价值。另外,既有研究对亲职、母职实践的探讨已较为丰富,聚焦子代的探讨却不够充分。对此,张煜麟曾指出,年轻世代子女在建构新兴家庭沟通模式上具有“能动性”,研究者需要跳脱过去家长保护或规范的角度,思索一套“以年轻人为中心”的数字家庭运作模式。^[12]朱丽丽等发现,子代在社交网络空间中无论是制造与父母的数字区隔,还是使用目的性剧本表演、分组可见等策略来回避和减少代际冲突,都已形成熟练策略。而主动向子女学习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父母,能同时与其增进线上线下的亲密感。^[13]Hsu也曾对澳大利亚的台湾移民如何用手机做好“跨国女儿”予以关注,发现其用不同的技术交流手段建构起自己的孝道等级,并以虚拟缺席的方式管理亲子关系。^[14]此类研究进一步向我们阐释了子代在这个“文化反哺”时代^[15]所具备的能动性,和子代实践丰富的挖掘价值。

对成年子代来说,因求学、工作、婚嫁等原因离家居住是造就远距离的主因,这种特殊情况提示我们:其家庭交往不仅体现为单纯的距离弥补,也同时寓于个人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变化之中,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经营亲密关系的策略。研究者在关注其代际互动和亲密关系构建时需要引入主动、动态的理论视角,将其看作一种在既有互动框架下不断调节、不断运行的社会实践。由此,将城市远距

离家庭中的子代作为研究对象,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国内远距离家庭研究的学术边界。

(二) 拍照作为一种“家庭展示”方式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引入“家庭展示”的概念,从而将子代的远距离交往视为一种动态实践。该概念由家庭社会学家 Janet Finch 提出,她将“展示”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向家庭成员和相关人士传达他们的某些行为的确是在“做家事”(doing family),并由此确认他们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过程。^[16] 该概念承袭自社会学家 Morgan 的“家庭实践”概念,其认为“家庭”不是一个稳定结构,而是在某一时间点上具有特定意义的、与家庭相联系的一系列日常活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多样性。^[17] 要想成为有效的“家庭实践”,个体行动需要以足够清晰的方式联系起与“家庭”相关的意义,以使它们能够被充分地理解为家庭惯例。^[16] 因此,“展示”显得分外重要。

依循“家庭展示”概念,一些传播学者逐渐注意到智能手机在流动“展示”母职、改变实践构型等方面的作用。^[18]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将手机拍照作为一种用于家庭展示的特殊工具。Caballero 访谈了墨尔本的 21 名海外劳工,揭晓他们向留守家庭成员通过手机拍照展示共同在场的四种策略:随意性、实用性、创造性和策略性。^[19] Ashley Barnwell 等对于 Instagram 上家庭帖子的分析证明,当儿女在数字平台上发布的照片用于家庭展示时,他们会巧用话题标签设计正面、积极的家庭脚本,并建立起一个微型的亲密空间。^[10] 本研究注意到,照片作为一种“充分传递信息功能的非语言手段”,早已承接人类记录经验、储存记忆、展示自我、建构形象的需求。^[20] 作为家庭交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还被视作中介化记忆的物质载体。^[21] 如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数字图像成为人们最常见的交往手段之一,既改变了拍照的形式和传统,也将远程家庭的交流延展出新的意义空间。因此,当我们讨论移动传播时代的家庭展示时,手机拍照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

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发现,国内传播学界对手机拍照实践的探讨主要停留在自拍^[22]和修图^[23]等行为上,几乎没有研究考察手机拍照如何用于家庭展示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孙信茹等曾对碧色寨旅游景区游客的拍照行为展开研究,发现其在特定的空间和身体表演中,重构了想象自我和群体的方式,展现了技术和个人身体互动的复杂关系。^[24] 赵洁认为城市中老年女性通过手机摄影在形象、自我价值和关系上完成了“自我再构”。^[25] 这可视为国内学界将拍照融入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些初步尝试。然而,对远距离家庭领域的探讨尚处于空白状态,更遑论对子代的探讨。中国的家庭生活拥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内里是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在当代又面临着个人主义取向和家庭主义取向的矛盾纠缠。^[3] 这种矛盾同样体现在子代的数字亲密关系构建过程中,亟待更加本土化的观照。

在梳理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城市远距离子代如何在与手机拍照有关的行为中进行家庭展示?子代的拍照家庭展示如何帮助他们构建代际的数字亲密关系?从子代家庭展示行为中,可以生发出对数字亲密关系怎样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本文是一项质的研究,^[26] 为了更深入、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采取深度访谈法。笔者于 2023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在微信、豆瓣小组等平台,采用公开招募和滚雪球的形式寻找访谈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依循“目的性抽样”原则,即以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为依据^[26] 采集样本。访谈对象需要因移民、求学、工作等原因,与家中成员保持一年以上时间的异地居住状态,并擅长通过手机拍照与家中长辈进行远距离交往。以该条件为标准进行筛选后,本研究总共联系到 12 位访谈对象(女性 8 位,男性 4 位),年龄在 20—33 岁之间不等,受教育程度涵盖本科与研究生学历,均处于就读或就业的状态(具体情况见表 1)。其中 4 位在线下以面对面的形式交流,8 位在线上采取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此外,为了观察拍照对数字亲密关系的形成路径和效果,本研究补充 3 位亲代成员进行线上访谈。在信息

达到饱和之后，本研究停止寻找新的访谈对象。

在访谈过程中，本文借鉴金伯格等^[27]关于手机照片使用的访谈方法，要求被访者提供与家人互动有关的 5 张手机相片和聊天记录截图，并请他们详细说明与这些图片相关的拍摄情境、使用意图等，进而结合他们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和信息，综合分析照片是如何促成家庭成员间的互动的。访谈的问题主要涉及：①拍照的场景、动机、内容取舍、差异策略；②在拍照互动过程中，子代对自己所扮演角色和需履行义务的认知情况；③子代在拍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对家庭的想象与感受，以及代际相处状态可能发生的变化。对亲代成员的访谈集中于探究他们与子代形成的关系模式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此的看法。

此外，在访谈开始之前，笔者会询问受访者的家庭基本情况，如果家庭结构特殊（譬如跨国家庭、亲戚之间来往密切的大家族、两代三人均异地分居的家庭等），笔者会根据其特有情况来挖掘与普通家庭可能存在的差异之处。每人访谈时间大约为 1—1.5 小时，在对方知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全程录音。

访谈结束后，本研究收集到 50 余张图片资料和录音转写后形成的近 20 万字的文字资料，并采用 Nvivo 数据处理软件对所得数据依次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最后从中整理归纳出研究结论。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年龄	所处阶段	与家人分隔时间	主要使用平台	交流频率
F01	23	本科	1 年	微信	每日
F02	24	研究生	2 年	微信、抖音	3—4 次/周
F03	21	本科	7 年	微信	每日
F04	22	本科	4 年	微信、抖音	每日
F05	33	工作	5 年	微信	1—2 次/周
F06	30	工作	3 年	微信	3—4 次/周
F07	24	研究生	6 年	微信、抖音、小红书	3—4 次/周
F08	27	研究生	9 年	微信、抖音、QQ	每日
M01	25	研究生	7 年	微信	1—2 次/周
M02	25	研究生	7 年	微信	每日
M03	26	工作	8 年	微信、QQ	1—2 次/周
M04	30	工作	5 年	微信	3—4 次/周
P01	54	工作	3 年（与子代）	微信	3—4 次/周
P02	49	工作	9 年（与子代）	微信、抖音	每日
P03	55	工作	6 年（与子代）	微信	每日

四、手机拍照：一种家庭展示实践

在人类学著作《静寂工人》中，作者曾用“像个男人”来解释码头工人的价值选择，“像个男人”不只是“像”，而是框架出一个日常的理想样态，让男人在当中行动，以及思考如何形塑自身。^[28]同理，思考如何“像个儿子/女儿”也反映出子代为自己设定的理想框架。本部分将紧扣“家庭展示”的理论脉络，探讨在外子代在进行种种手机拍照行为时，是如何将相片整合进自己表面或潜在的意图和

日常实践的。

(一) 碎片生活: 返璞归真的日常景观

研究发现, 绝大多数子代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作为拍摄的主要对象, 包括每日饮食、聚会见闻和路边景象等等, “譬如早中晚饭, 这是最基本的。或者我有时候去公园散步, 就会拍公园的视频和照片, 再发到群里面”(F06)。除此之外, 毕业、得奖、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等荣誉性时刻, 也会被他们拍摄下来并及时发送给父母, 这样既可以放大自己的快乐, 又能让远方的父母心生喜悦、为自己骄傲。

在子代看来, 拍照相比其他交流方式拥有更高的自由度, 可以自行控制分享节奏。有受访者提到他们会在微信聊天时直接使用界面内嵌的拍摄功能捕捉并发送自己当时的生活瞬间, 认为这是最方便、及时的方式(F08), 但更多子代会选择先拍摄, 保存想发给家人的照片, 再选择合适时机一块发送: “如果是视频聊天的话, 因为我妈在韩国, 跟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她) 那边下班以后简单洗漱一下, 上床之后我们才会聊天。但是图片的话随时都可以发, 我妈她会看, 只是不回我而已”(F05)。

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照片分享相比以强关系为主、半公开性质的朋友圈分享, 更像是一种单纯、素朴的原生态行为展示。秦兰珺认为发在朋友圈的照片同时延续了“快照文化”和“广告文化”两种视觉传统, 后者是一种处心积虑的视觉修辞, 前者则倾向于天真无邪的纪实影像。^[23] 被访子代的拍摄初衷更贴近“快照文化”的传统, 却更为随意, “如果你展现在朋友圈给别人看的话, 就会想怎么好看一点, 比如加一个滤镜或者文字修饰什么的在图片上面。但在家人面前就(会)非常真实, 非常自然”(F08)。这些“随手一拍”不在意采光、构图、调色等摄影美学要求, 固然不及朋友圈照片那般构图细致, 但它们却饱含着大量生活信息, 淡化了年轻人对自身人设经营的潜在意图和对外界社会价值观的迎合, 在纯粹的私域分享中重新定义了“什么更值得拍摄与发送”。

(二) 内容取舍: 展示积极独立的理想一面

尽管在形式上不经修饰, 但子代依旧在照片中隐藏了管理形象的考虑。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自己希望通过分享生活照片向父母呈现出一个积极、开朗、独立的“好”儿子/女儿的形象, 因此他们会刻意地对照片内容进行筛选。通过选择特定的物品、场景和角度等, 来展现自己积极学习与生活的态度, 而将所遭遇的挫折、心情的沮丧, 或可能会与长辈造成冲突的内容隐藏起来——也就是“报喜不报忧”。“我给我爸妈发的照片都是展现我积极阳光的一面, 很努力的一面, 生活幸福美好的一面, 让他们觉得有我这样的女儿是他们的福气。在他们面前总是考虑扮演好一个让他们不操心的女儿, 一个元气满满的、有朝气的进步青年, (哪怕)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F01)。“我只给他们发在实习单位中午吃了什么, 咱们领导有多好, 包括礼品、健身房。只发积极的一面, 让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就可以。反正那种烦心的东西, 我是不会跟他们讲的”(M02)。

在总结动机时, 受访者的回答因其家庭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些人认为这是让镜头呈现出“父母想看到的样子”, 扮演好一个不让他们操心的儿子/女儿, 这样的形象可能只是父母希望看到的, 也可能是自己愿意去达到的(M01; F01)。而在另一些子代成员眼中, 这样展现自己, 其实有某种类似反抗的意味, 即告知父母自己在外也能过得很好, 因此“独立”是其希望反映在相片中最为突出的特质(F05)。然而本文发现, 尽管有着不同的出发点, 但远距离家庭的子代成员们在一点上存有共识, 那就是这种角色设置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父母家人“放心”。

(三) 维持在场: 用分享习惯消解时空区隔

除了展现某种具体的形象, 通过分享相片维持自身在场也是子代成员希望照片能够发挥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他们看来, 比起具体地表达某种态度, 通过拍摄、分享这个行为本身所体现出的日常生活惯例反而是更关键的部分, 对此, 他们可能会使用诸如“习惯”“陪伴”之类的词汇来概括。例如: “我不想成为一个默默消失(的人), 想让家人知道我的存在。因为如果我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他

们肯定会想我去干嘛了。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有这种担忧，所以就会尽力去分享”（F08）。对 F08 来说，这些图像是一种常规的、习惯性的存在，表征着各自有条不紊的生活。她认为一个氛围融洽的家庭应该是顺其自然的“分享”式，而非刻意要求的“汇报”式。这代表了大多数受访者的潜在动机：发自己的生活照片是一种无需花费多少力气，但却十分必要的行为，否则会招致亲子关系的疏离。而移动摄影相比文字，其对场景随意捕捉、直观展现的功能展现非功利的特质，更能塑造出一种悄然存在于两代之间的存有感。^[29]

进而，一些子代成员会借助社交平台功能与亲代演练出某些重复性、个性化的分享惯例：“我和我妈是抖音互关，里面有一个密友时刻。互加为密友之后，在她的手机桌面上有一个小组件，里头会时刻反映我拍的照片。只要上传上去，她那边的桌面就会显示”（F01）。在 F01 看来，这是她与母亲心照不宣的约定。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传播并不是空间上讯息的延展，而是时间上社会的维系，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30]此时，子代的拍照行为具有仪式性的特征，在亲子间设置了稳定、持续的关注的焦点，让彼此进入相同的节奏，^[31]从而对远距离带来的不便进行积极协调与弥补。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作为子女的存在，比显示自己是什么样的子女更能彰显出 Finch 所说的传达“类家庭关系”（family-like）的意涵。^[16]

（四）记忆媒介：存档、编辑相片促进交往延续

图像具有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并非指与思想的同质，而是情感的强烈溢出与表达，包含不可控的情绪潜力，因而也是对记忆有力的激发。^[32]相比亲代，子代作为“数字代沟”的强势一端，拥有更加娴熟的新媒体使用技能，其中自然包括对照片数据的处理，而这种处理行为往往会成为新的家庭交往契机。

许多受访者提到，自己会专门建立电子相册来存放与家人往来的照片，除此之外还会有 U 盘、百度网盘、QQ 空间相册等存储方式。一方面，他们直接将手机摄影迁移备份，另一方面也会将曾经的实体照片拍摄下来进行数字化处理，再一并存储。如 F01 的家庭每年都会照一张全家福，而她会每年为全家福和当年的其他合影建立一个新的手机相册。而后，这些照片会在他们异地而居时牵系起亲代的交流愿望。譬如有受访者提到，她与母亲互加百度网盘好友后，母亲在看到有意思的相片时会邀请她在网盘中一起标记，再度观看与回忆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刻（F03）。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这个案例：“我外婆现在有点老年痴呆，我们家里面就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保姆的审美很好，会记录我外婆（的生活）。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外婆在花丛中，正好后面是马路，有一辆卡车飞驰而过。我就直接收藏下来，去美图秀秀里面调一调，再发到群里面去。他们觉得这张照片像电影海报一样，（纷纷夸赞）调得不错，然后（把我发的照片）再保存下来”（F04）。

F04 的陈述生动反映出一张照片是如何牵引起家庭互动的。照片成型之后，历经分享、保存，再被重新编辑，最后进入旅行、驻足与被迫忆的循环。在这个流转过程中，它承载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情感体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照片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媒介。^[32]它会在每一个站点，通过子代对其形态的改变（如变为云盘数据，或被修图软件改造）嵌入家庭交往的延续性行动中——这既是家庭互动的产物，又会引发新的家庭互动，令子代的家庭实践与整个家庭的记忆相互交织、缠绕。

五、以影传情：拍照互动实践中的数字亲密关系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具备交互性和用户生成内容特质的社交媒体的普及，为亲密关系的开启、维系、呈现和构建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甚至重新定义和塑造了人们的亲密关系。^[8]在描述子代如何进行家庭展示之后，本节将继续探讨这种家庭展示行为如何帮助子代构建远距离下的数字亲密关系，这种代际亲密又让我们对子代生成何种认识。

(一) 引领亲密: 自我嵌入增强情感联系

本研究发现,许多子女认为手机拍照是塑造、改变与父母亲密关系的契机。实际上,手机拍照变成了子代主动将自我嵌入亲子生活的表现,令子代变成数字化亲密的组织者与引领者。

一方面,许多受访者希望自己能成为联系家庭团结友爱的纽带,因此会在家庭成员因观念和习惯的不同而在浏览照片过程中发生冲突时,扮演起调解员的角色。如F05回忆道:“(有一次)我爸下班开车的时候,随手拍了一张外头的云朵。他没有什么构图,我妈就会说不好看,这么好的天让你拍成这样了。我一听到这话,就立马在里面发语音、打字说还挺好看的,咱自己家人看哪有那么多构图。我妈就说对,之后也就不说话了,(矛盾)瞬间就化解了”。

另一方面,有受访者表示如果长时间与父母处于离散状态中,会格外期待分享照片后父母的回应,从而让心里的交流纽带缔结得更稳固,在异乡收获情感疗愈。“昨天品牌客户送我们口红,我就特地发到家庭群里面。如果我很想分享,但他们给的态度不够的时候,我晚上就会问,收到照片了吗?他们说收到了,我再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他们讲,让他们给到令我很满意的反馈后才结束”(F06)。F06亲代成员的回答也印证了,此类契机往往将亲子间的情感纽带锻造得更加牢固。“她(跟我们说过)分享这些,还是希望得到我们的回应。之后基本上她每一次发照片,我就会在底下评,或者(夸赞)两句。看到这些照片跟她聊两句,我们心里都踏实很多”(P01)。

一些家庭研究者发现,在“啃老”、代际育儿合作等现象中,情感在建构成年子女与父母互助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33]在上述案例中,子代以家庭和睦和个体情感诉求为出发点,通过持续的自我表露和话题参与引领亲子之间的良性沟通,从而在心理层面减轻埋怨、思念、孤独等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此时,照片已逐渐变成子代用来连接彼此的“黏合剂”。这不仅再次印证子代日益增强的能动性,更说明比起理性和传统规范,子代主动搭建的情感联系在维持亲密关系时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 调试距离: 平衡个体意识与代际团结

Finch在讨论家庭展示对理解家庭关系的必要性时,曾提到“与其定义家庭展示应该作用于某种特定的家庭类型,倒不如思考一个家庭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所需要的展示强度”^[16]。也就是说,伴随着一个家庭成员个人身份的变化,联络家庭关系的动机与程度也会发生明显改变。但过往研究却忽视了这个层面,更多着墨于亲代对现有家庭角色的再现与强调。而本文资料却显示出与之相类的事实:手机拍照除了能催化亲密关系,也能帮助子代有意识地重新厘定关系、调适亲密等级。

首先,相比于视频和文字,照片这种社交线索适中的方式,最能帮助他们维持两代人之间合适的距离感。“我其实是喜欢和父母之间亲密又疏远的那种关系:大部分(内容)都能聊,但(关系)又不要靠得太近。这种图片聊天里面会少很多训诫的意思,只是一种分享。它可以让彼此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过得好不好,但又不会特别亲密。如果是视频通话,可能需要再绷紧一点神经,因为在一个马上要互动的场景里面”(M04)。

此外,笔者还发现,许多还未成家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尽管目前与亲代维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但终究会从中脱离,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这种意识在看到亲代的照片时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对我的家庭非常依赖,但当到了异地之后,内心就有一点想要组建我自己的家庭(的想法)。感觉到我在慢慢地退出。但我会去参考她们跟我外婆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它模拟成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F08)。与此同时,亲代一方也对该进程有所理解:“(他们)这个年纪要多认识人,站稳脚跟,以后都是要成家立业的。现在不要去在乎有没有钱什么,一定要开阔自己的眼界”(P02)。

这种生命历程的对照,实际上再度反映出子代在年龄增长过程中微妙的情感逻辑。康岚曾用“新家庭主义”来描述青年人个体化进程中的新代际关系。在他们的选择中,个体主义和家庭主义并非简单对立的两极,而是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依旧保留着对家的认同和心理需求,但需建立在与前者

相平衡的前提上，这被作者看作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有力佐证。^[11] 在本文看来，子代的家庭展示反映出与之类似的逻辑，他们既有意识地联结彼此，又会因为自己的家庭状态、所处情境和个人需求调节亲密的距离，从而在个体意识与代际团结之间寻求平衡。这既是对他们家庭角色的“展示”，也是对作为个体的完整社会角色的再次巩固。

（三）孕育“安心”：家庭感的多重面貌和精神本质

“家庭”所代表的亲密关系不仅是一种实际联结，更是关联到个体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世界中形成的地方感。^[19] 同理，手机拍照对家庭的影响不仅在于实际的亲子交互，更体现为一种想象的生成。这种“家庭感”在访谈中虽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却也拥有一条较为清晰且类似的主线。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拍照能再现曾经亲密无间的家庭情境。“它是一种代偿，可以让爸妈觉得女儿还在他们身边，或者说实时掌握我的动态，至少关系不是淡漠的。而父母也会展现他们的生活，（让我）感觉妈妈还在身边，或者离我不远”（F01）。而这也是移动媒体用时间消灭空间，造福社会交往的价值之一。

不过，这并非子代对家庭的全部想象。例如同样在 F01 看来，尽管家在数字化的照片中有所体现，但真正的家并非完全是数字化的，也并非跟地理场合最相关。“它（说到底）是人心所在的地方。照片只是体现我们亲近的一种方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只是用数字的方式寄托了你的情感。我觉得有父母在的地方，哪里都是家，不是指那个房子，而是指自己的心灵故乡”。另一位子代成员也表示，最重要的是在分享时产生的一种安心与依赖感：“和朋友分享不一定会理我，但我知道跟父母分享，他们肯定会（理我）的”（F07）。

在资料中索隐钩沉，“安心”成为子代描绘家庭想象的高频词汇。这种感受既夹杂在子代自己的发送行为中，也会在子代接受亲代发来的照片时出现。譬如 F03 提到：“有时候我让妈妈发最近的照片，上面有一些亲戚，基本没见过几面。我会有一种既想他们，又比较安心的感觉。哪怕我没有在国内陪伴父母，但还有其他亲人，也能够让我爸爸妈妈、姥姥不觉得孤单寂寞，这让我觉得很欣慰。”

概而言之，“安心”是子代在移动传播语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亲密观，它或许可以将我们引导到对家庭关系更为本质的探讨上。彼得斯曾言，交流不应该成为由孤独心灵和可怕的幽灵造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问题；衡量交流的尺度应该看其是否带来了行为的协调。^[34] 当我们下落到本文语境中，就会发现图像和社交媒体的结合并不能为远距离家庭关系带来惊天动地的改变，但这或许并不是子代的意图所在。子代成员更希望的是能够让亲子的行动达到一种协调状态，感受心灵的融汇。这类同于郭建斌所讨论的，家在社会结构意义、关系意义、空间意义外的最后一种形式——家是“心安之所”^[35]。它在代际伦理与电子界面的糅合中产生，但并非全部，而是淬炼出一种在持续不断地交流中达到的精神气候。照片的作用是定格与分享生活，而家人之间观看、分享与发布照片的行为，绝不仅仅是看见对方的生活日常，更是看见“家庭”这个心之所向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需要与对方在同一个时空下进行亲密举动，却深刻知道自己正“运作着家庭关系”^[16]。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子代的手机拍照行为，试图更准确地理解远距离家庭情境中的数字亲密关系。基于对 12 位子代和 3 位亲代的访谈，本研究发现：第一，子代拍下的是自己日常生活中最为随意、真实的影像，但会通过取舍照片内容、编辑照片形态、维持分享习惯等手段来展示自己积极独立、关心父母的“好”儿女形象。第二，基于照片的家庭展示功能，子代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与亲代之间的数字亲密关系，帮助他们在缔造情感纽带的同时觉知和尊重自己的个人意识，在脱域的时空关系中构建自己的数字亲密想象。基于此，本研究展开以下讨论：

首先,在当下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亲子关系呈现出相当矛盾的面貌。早有研究指出在亲子关系中,联结(solidarity)与冲突(conflict)等正负向关系往往并存。^[36]对此,更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概念。^[37]当前子代既受个体化思潮的影响,试图摆脱传统家庭规范的束缚,但又开始重估家庭价值,甚至表现出向亲权与孝道回归的自反性现象。^[38]而目前的远距离家庭传播研究集中在关系受挫—技术弥补—(因多种社会因素)再受挫的逻辑链条之中,还未与上述发现相对接。本研究认为,子代的远距离家庭交往并非简单地再造亲密,而是呈现出一种“寓于家庭主义之中的能动联结”,他们凭借能动性主动调适数字亲密关系的契机、形态和强度,不至于让远方的亲代左右自己的个体意识,但又在千里之外自愿回应家庭的召唤,从而减轻独自探索社会世界的脱域感。于是,情感联结顺理成章地取代父母权威和代际责任伦理,成为远距离交往的主导逻辑。

其次,家庭展示作为一个经典概念,提供给我们两个分析抓手,其一是提到“相片作为一种工具”,其二是家庭展示在家庭状态出现变化时至关重要,而本研究的发现正是数字时代对其理路的继承与发展。智能手机与拍照功能的结合为子代提供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沟通方式:既保留了视觉语言的直观特征,又不用像文字那样字斟句酌,同时还能较自由地控制自己所要传递的信息。这大大加强了子代在家庭展示时的协调性,并且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情感价值。张珺在对城市家庭的汽车消费研究中提出“协商性孝道”(negotiating filial piety),认为“孝”在城市中产阶层青年中仍具有道德上的不可置疑性,但年轻人的服从不再是伦理核心,关键是对家人的重视和负责,在实践上表现为一种以关爱和情感为核心的协商。^[39]受此启发,本研究认为子代的手机拍照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协调性情感展示”,展开的是以关爱、思念、安心等情感体验为目标的协调性行动——也就是妥善安置父母在“心安之所”的位置,但依旧指向自己的生活诉求,这与上述子代的交往需求不谋而合。相片既塑造他们的展示意图,又影响其展示结果。

《论语·里仁》中提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反映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在个体追求过程中在距离和家庭之间难以取舍的深深纠葛。在流动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一个家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本研究以照片为透镜(有趣的是,照片本身就是“镜头”的产物),折射出现代家庭在社会转型和技术变革共同形塑下的新交往图景——虽远犹近,亲密“有间”,以“影”传情,见“影”如面。

参考文献:

- [1] 孙信茹,王东林.“抖音之家”:新技术与家庭互动的文化阐释[J].新闻大学,2021(10):58-75.
- [2] 邱志勇.视觉性的超越与语艺的复访:数位时代视觉语艺的初探性研究[J].中华传播学刊,2014(26):107-135.
- [3]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172-191.
- [4] 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0):148-171.
- [5] Madianou, M. & Miller, D. (2011). Mobile phone parenting: Reconfigu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lipina migrant moth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New Media & Society*, 13 (3): 457-470. Madianou, M. & Miller, D.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Abingdon, UK: Routledge. Francisco, V. (2015). 'The internet is magic': Technology, intimacy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Critical Sociology*, 41 (1): 173-190.
- [6] 王嵩音.虽远似近——亲子关系维系与沟通管道之分析[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47):55-85.
- [7] 吕山,李熠,林颖.远距离“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2(11):92-106.
- [8] 蒋俏蕾,凌绮.数智时代的“亲密”:媒介化亲密、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J].山东社会科学,2023(3):87-96.
- [9] 胡春阳,周劲.经由微信的人际传播研究(一)[J].新闻大学,2015(6):50-60.
- [10] Barnwell, A., Neves, B. B. & Ravn, S. (2023). Captured and captioned: Representing family life on Instagram. *New Media & Society*, 25 (5): 921-942.
- [11] 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青年研究,2012(3):21-29,94.
- [12] 张煜麟.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J].青年研究,2015(3):48-57,95.

- [13] 朱丽丽, 李灵琳.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 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5): 95-104.
- [14] Hsu, J. & Feng, Y. (2021). Filial technologies: Transnational daughterhood and polymedia environments in transnational Taiwanese famil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 (4): 507-522.
- [15] 周裕琼. 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 [J]. 现代传播, 2014 (2): 117-123.
- [16] Finch, J. (2007). Displaying families. *Sociology*, 41 (1): 65-81.
- [17] Morgan, D. H. J. (1996). *Family connec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8] Waruwu, B. K. (2022). Smartphone mothering and mediated family display: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s in a polymedia environment among Indonesian mothers in Hong Kong.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0 (1): 97-114.
- [19] Cabalquinto, E. C. (2019). ‘They could picture me, or I could picture them’: ‘Displaying’ family life beyond borders through mobile photograph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 1-17.
- [20] 李佳楠, 牟怡. 作为媒介的自拍: 基于技术偏向性的审视 [J]. 传媒观察, 2022 (9): 51-58.
- [21] Van Dijck, J.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唐宏峰, 尹倩文. 自拍、朋友圈与表情包——网络图像的政治 [J]. 文学与文化, 2017 (1): 46-56.
- [23] 秦兰珺. 论朋友圈照片: 生活的广告化与广告的生活化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2 (4): 152-162.
- [24] 孙信茹, 王东林. 身体表演与拍照的意义生产——社交媒体时代个人影像实践的田野考察 [J]. 新闻大学, 2019 (3): 1-18.
- [25] 赵洁. 手机传播与自我再构——基于 K 市中老年女性的研究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20.
- [26]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5.
- [27] Kindberg, T., Spasojevic, M., Fleck, R. & Sellen, A. (2005). The ubiquitous camera: An in-depth study of camera phone use. *IEEE Pervasive Computing*, 4 (2): 42-50.
- [28] 魏明毅. 静寂工人: 码头的日与夜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73.
- [29] 孙玮. 微信: 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J]. 学术月刊, 2015 (12): 5-18.
- [30] [美]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丁未,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5.
- [31] [美]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 [M]. 林聚任,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12.
- [32] 宋思静. 记忆媒介: 存放, 重塑与纠缠 [J]. 东南传播, 2022 (8): 61-63.
- [33] 刘汶蓉.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J]. 社会学研究, 2016 (4): 145-168.
- [34] [美] 约翰·彼得斯. 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 [M]. 邓建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156.
- [35] 郭建斌, 王亮. “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视角——基于“独乡”20 年田野资料的讨论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11): 49-68.
- [36] Bengtson, V. L., Rosenthal, C. & Burton, L. (1995). Paradoxes of families and aging. In Robert, B. & George, L.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34-259.
- [37] Luescher, K. & Pillemer, K.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 (2): 413-425.
- [38] 刘汶蓉, 李博健. 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 [J]. 青年研究, 2020 (3): 80-93.
- [39] 张珺. 驶向现代性: 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 169.

[责任编辑: 华晓红]